

西夏立国长久原因探析

李清凌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西夏是中国西北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民族政权,其势力范围,经济、军事实力等都远逊于宋、辽、金,却能立国长达190年之久。究其原因,有宋朝国策的失误,也有辽、金等国的支持,而主要的内在原因则是党项民族俗尚武力,统帅人才杰出,军事形势优越以及农牧业生产基础好,养兵不用禄食。历史经验说明,在民族政权的相互较量中,积极进取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优化的资源整合和有利的外部环境,可以弥补诸多不利因素,取得以小御大、以弱敌强的政治军事效果。

[关键词]西夏;政治策略;政治史

[中图分类号]K2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8-0005-06

西夏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割据政权。从隋唐前期党项人内迁算起,经过400多年的曲折奋斗,党项终于由弱到强,在西北东部站稳脚跟,形成了以夏州(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白城子)为核心的党项民族政治实体。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元昊建国称帝,至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西夏被蒙古国所灭,其间又闪亮存在了190年。党项西夏何以能够在势力较弱,建国后地盘、经济和军事力量明显不如宋、辽、金等政权的形势下,先后与这些国家相周旋而长久地存在呢?本文就此作一分析和介绍。

一、几组值得注意的数字

(一)人口

西夏人口是辽、宋、夏、金几个政权中最少的。据学者考证认定,辽在其人口最为鼎盛的天祚帝初期(12世纪初),全国约有900万人。北宋晚期的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有人口45324154人。南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有人口12669684人,按每户5口估计,其总人口当是63348420人。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金朝人口当有8413164户,计53532151人。

史书上没有西夏全国人口的确切数字。漆侠先生估计庆历四年(1044)西夏有“二十万户左右、一百万人上下”。葛剑雄认为,西夏“总人口至少在300万以上”,吴松弟赞同这一看法。他们所依据的史料都是北宋仁宗时期的崇政殿说书赵师民奏疏中的一段话:

羌贼所盗陕西数州,于本路十二分之二,校其人众,七八分之一,虽兼戎狄,亦不过五六分之一;穷塞之地土至薄,校其财

力,二十分之一。今乃举天下之兵,引海内之财,未有成功,益为虚费,固有以使之然也。

以上诸位先生在引用这条史料讨论西夏人口时,都疏忽了史料中“陕西数州”、“本路”等关键词的确切所指,因而结论有不够准确的地方,本文不欲详加讨论。但就算西夏人口已经达到了300万人左右,那也与辽、宋、金尤其是宋、金两朝的人口差距太大,连1/10都不到。

(二)统治规模

北宋晚期的徽宗宣和四年(1122),宋朝“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监六十三,县一千二百三十四”,南宋“驻蹕吴会,中原、陕西尽入于金,东画长淮,西割商、秦之半,以散关为界,其所存者两浙、两淮、江东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广东、广西十五路而已”,这仍然是西夏所不能比拟的。

辽自兴宗(1031~1055)以后,“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胘胸河,南至白沟”。

金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其间散府九,节镇三十六,防御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军十有六,县六百三十二。后复尽升军为州,或升城堡寨镇为县,是以金之京府州凡百七十九,县加于旧五十一,城寨堡关百二十二,镇四百八十八”。

相比之下,西夏“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包括河南的灵、洪、宥、银、夏、石、盐、南威、会共九州。河

西的兴、定、怀、永、凉、甘、肃、瓜、沙共九州。熙、秦河外的西宁、乐、廓、积石共四州。其中有些州面积较大,有些是由以前的城寨升定的,管辖范围相当小。其整个版图与辽、宋、金难以比肩。

(三)军队

北宋仁宗庆历时期(1041~1048),禁、厢兵之籍“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⑪北宋此后军力都基本保持在百万人以上。南宋绍兴时,由韩世忠率领的御前护军,刘光世率领的左护军,张俊率领的中护军,岳飞率领的后护军和吴玠率领的右护军合称御前诸军,共38.2万人,是当时的国家正规军。宋孝宗时确定的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衙军又共有12.4万人。此外尚有禁兵、厢兵、土兵、弓手等20余万,为非正规军,只是这部分军队已经衰弱到不任战斗了。正如殿中侍御史杜莘老所说:“今东南厢、禁、土军,元(原)额毋虑十数万人,皆为监司守臣兵将官穴占,而诸路将副,或以给使吏职,富势居之,咸不适于用。”^⑫

辽国实行全民皆兵制,“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统统隶属于兵籍”。它的御帐亲军有50万骑,诸宫卫丁40.8万人(其中出骑军10.1万员)。^⑬上京临潢府(治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东京辽阳府(治今辽宁辽阳市),中京大定府(治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名城),南京析津府(治今北京市)以及西京大同府(治今山西大同市)五京民丁,见于记载的有1107300,均为乡兵。^⑭总御帐亲军、十二宫、一府、五京(中京缺载),加上东京至鸭绿江西北峰驻防兵22000人,合计有兵员1664800。其中尚不包括宫丁、大首领、诸部族,中京、头下等州以及属国之兵众。^⑮

金国也实行“壮者皆兵”及猛安、谋克制度。它“俗本鸷劲,人多沉雄”,一度“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⑯金初诸部之民无他徭役,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孳征兵,金世宗大定时(1161~1189),有猛安202个,谋克1878个,民户615624。^⑰在战争中,金朝统治者不仅调集本族人,还征发属下汉、契丹、奚等族青壮年打仗,因而动辄能够集中数十万军队。成吉思汗攻金,金朝北边千户、契丹人耶律留哥投蒙,“金人遣胡沙帅军60万,号百万,来攻留哥”。^⑱完颜亮正隆六年(1161),金发兵六十万,^⑲企图一举灭宋。金完颜永济大安三年(1211),成吉思汗在野狐岭(在今河北万全县西北)击溃金朝守军30万人。在蒙古军的压力

下,金朝末年迁都于南京(今河南开封市),又从各地选调精锐部队,组建起一支直属于枢密院的30万人的大军,是这一时期金朝的主力军。以上几个数字显示了金朝的军事实力。

西夏建国后,置十二监军司,委豪右分统其众。史载它的军力部署,“自河北至午腊弱山七万人,以备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盐州、罗落、天都、惟精山等五万人,以备环、庆、镇戎、原州;左厢宥州路五万人,以备鄯、延、麟、府;右厢甘州路三万人,以备西蕃、回纥;贺兰驻兵五万、灵州五万人、兴州兴庆府七万人为镇守,总五十余万”。^⑳“别有擒生十万……别副以兵七万为资贍”。^㉑“擒生”是专门解决军粮问题的,“资贍”是承担后勤服务的在编军人。把这两部分也算进去,西夏的军队当有60余万人。这是其最盛时期的数字。史载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九月,夏军50万众大入鄯延,“西自顺宁、招安砦,东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门、龙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间相继不绝,至延州北五里”。^㉒说明西夏确实也有庞大的军队编制。同时,单从军队数字看,西夏的军队虽然比不上北宋和辽国,但与南宋、金国相颉颃。

《辽史》称“西夏弹丸之地”,的确,西夏的地盘、人口、军力以及经济实力等确实比不上辽、宋。然而它南败宋,东抗辽、金,立国近200年,以一个较弱的政权,在大国、强国的夹隙中顽强地找出路、求发展,终于创造了一个以弱敌强、享祚绵长、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而又深远的政治奇迹。历代政治家、史学家不断地在寻找和总结西夏立国长久的原因,如元人在《辽史·兵卫志》中总结出“西北士马雄劲”,“元昊,谅祚智勇过人”,“襟山带河,有以助其势耳”^㉓等几条。下面,我们在此基础上,再从内外政治环境等方面作以探索。

二、外部环境:宋、辽等国的影响

西夏所占的地盘,汉唐以来甚至更早都是中原王朝的辖地,因此,宋朝政府一直不承认夏的合法性。然而,宋朝在立国策略上的重内轻外、重文轻武、掣肘边防将帅的做法,客观上有利于西夏的长期存在和发展。辽、金等政权为了引夏制宋,对夏国采取拉拢、呵护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西夏的活动空间。

宋朝政府坚持“重内轻外”的治国理念和策略,早已被学界所公认。重内轻外是宋朝统治者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奸臣窃命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升华出来的治国策略。然而就是在这—政治观念的支配下,宋朝最高统治者在处理内外政治关系时,总是从政策措施上强硬不起

来,甚至消极地企图通过优厚的物质利益,使周边各族放弃入掠活动,结果反而助长了西夏统治者的政治野心。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正月,欧阳修上疏云:

国家自宝元、庆历以后,一方用兵,天下骚动,国虚民敝。如此数年,元昊知我有厌兵之意,遂复议和。而国家待之恩礼,又异于前矣。号为国主,仅得其称臣,岁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时,半于契丹之数。今者谅祚虽曰狂童,然而习见其家世所为,盖继迁一叛而复王封,元昊再叛而为国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国,以为鼎峙之势尔。^{②4}

宋朝政府轻敌玩寇,不思选将练兵,还经常派宦官监督统军将领,或实行遥控,连陕西前线对垒布阵的具体事务,也要报请朝廷审批。这样的军事机制和做法,极容易贻误战机,而对夏国来说则十分有利。宝元至庆历年间(1038~1048),元昊建国,宋朝上下惊慌之下,仓卒指挥,在陕西沿边“屯兵四十余万,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万”,^{②5}然皆不得其用,卒无成功,究其原因,盖“以不知边事之谋臣,取不识干戈之将;用骄兵,执朽器,以当桀黠新兴之敌,此所以败也”。^{②6}

欧阳修还认为,宋朝一度在对夏策略上,“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数”。言其大者,“攻守之?皆失尔”。他在上疏中说:

臣视庆历御边之备,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余里,分为路者五,而分为州、为军者二十有四,而军州分为寨为堡为城者又几二百,皆须列兵而守之,故吾兵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贼之出也,常举其国众,合聚为一而来。是吾兵虽多,分之为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将,所谓战兵者,分在二十四州军,欲合而出,则惧复空而无备,欲各留守备,而合其余,则数少不足以出攻。此当时所以用兵,累年终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进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谓攻守皆无策者。

宋朝武将在朝廷、军士在社会,都被舆论所轻视。相反,读书人,考中进士者,则“宠章殊异,历代所未有也”。^{②7}这一重文轻武的政治倾向,对社会、家长和青年人都是一种极为强烈的择业导向。它还给那些见利忘义的武将们提供了背叛的借口。宋亡以后,元世祖曾“召宋降将问曰:‘汝等何降之易耶?’对曰:‘贾似道专国,每优礼文士而轻武臣,臣等久积不平,故望风送款。’”^{②8}这一回答遭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斥责,认为他们不是忠臣,但也反映了宋朝优礼文士而轻武臣的严重后果。

宋朝边将严重的腐败作风,也帮了敌国西夏的大忙。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五月,夏人集聚了号称10万人筑堡,知庆州李复圭合蕃汉兵才3000人,就逼遣偏将李信、刘甫、种咏等出战。信等诉以众寡不敌,复圭便以“节制”的身份相威胁,结果一战大败。李复圭为了解脱责任,乃捕李信等人而取其图略,命州官弹劾李信等“故违节制”,致使种咏瘐死狱中,李信、刘甫等被斩或配流。此后不久,李复圭进袭金汤堡(在今陕西吴旗县东南),其时夏军已经撤走,复圭军杀老幼一二百人,就“以功告捷”。宋朝腐败官吏的这些做法,引起了边境军民的极大混乱和怨愤,也为西夏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机会。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正月,宋将种谔谋取横山,领兵先筑了许多城寨,并派军队驻守。二月,夏人来攻顺宁寨(即今陕西志丹县西北顺宁镇),复围抚宁城(在今陕西子洲县北),宋将折继世、高永能等拥兵驻扎在细浮图寨(又名克戎寨,今陕西子洲县),附近的啰兀城(在今陕西米脂县西北)也有不少的驻军,主将种谔在绥德军节制诸军,部下军队并不少。然而种谔听到夏兵打过来的消息后,竟茫然不知所措,想要写信召燕达带兵来援,又“战怖不能下笔,顾转运判官李南公涕泗不已”。^{②9}种家将昏庸堕落至此,难怪战争的结果是新筑诸堡悉陷,千余将士战死。

再如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大宦官童贯逼刘法去攻朔方郡(即夏州)。刘法不得已,只好领兵2万出征。夏国主之弟察哥郎君率步骑列为三阵,迎击刘法前军,而别遣精骑登山出其后。大战七个时辰,宋军大败,刘法乘夜逃跑,坠崖折足,被夏国一个小卒斩首而去。整个战役,宋军死者10万,这样惨重的一次败仗,童贯竟“隐其败而以捷闻”,“受解围之赏者数百人”。^{③0}这一切,都让夏人看在眼里,伺机而动,游刃有余。

辽国的一些政策也有利于西夏的角逐。宋太宗雍

熙二年(985)二月,李继迁采用汉人谋士张浦之策,攻占银州(治今陕西横山县东党岔),宋派李继隆出兵讨继迁,继迁弃银州而去,并遣使向辽称臣请婚,辽圣宗以宗室女为义成公主嫁继迁,又授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都督夏州诸军事。宋太宗淳化元年(990),辽册封李继迁为夏国王,公然支持李继迁与宋朝相对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西夏集结军队,宋朝的延、渭、庆州一带各有数千骑出没,“声言假兵于辽矣”,这年,辽国果然“以成安公主嫁乾顺”。^③辽对夏的策动和扶持,固然首先是出于它自身与宋朝对垒的需要,然而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西夏抗宋的胆量。

此外,金朝、吐蕃等外部势力的并列存在,也使党项西夏在当时的各种政治军事较量中左右有据,借以为援。

中国历代中原王朝都很担心并着力防范西北民族与北方民族相联合,对中原政权构成强大的军事威胁。宋王朝也是这样。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九月,富弼在上疏中说:

西北相结,乱华为虞,自古闻之,于今见矣。顷者,元昊援契丹为亲,私自相通,共谋寇难,缓则指为声势,急则假其师徒,至有犄角为奇,首尾相应。彼若多作牵制,我则困于分张。盖先已结大敌之援,方敢立中原之敌。^④

这是说元昊之所以敢于公然称帝,而与中原政权相对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先已结大敌之援”,得到辽国的支持。反过来说,辽国的支持,是李继迁反宋、元昊建国割据的强大政治军事外援,而其他并列政治势力的存在,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三、内部条件:西夏立国长久的主因

西夏立国长久的主要原因是内因,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俗尚武力,全民皆兵

中国西北各族从先秦以来就在广袤的地理环境、复杂的民族社会条件下形成了崇尚武力的民族精神。党项西夏人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精神,“俗尚武力”,^⑤“人人习骑射,乐战斗,耐饥渴,其视冒矢石,蹈锋刃,死行阵若谈笑然。故能惊边徼,摩封疆,出没飘暴,不可制驭”。^⑥陕西横山一带的党项蕃部,东至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县西北杨家城)、府州(治今陕西府谷县),西

至原州(治今甘肃镇原县)、渭州(治今甘肃平凉市),200余里,人马精强,惯习战斗,是西夏的一支劲旅。横山一带的地理、物资条件也较好。宋将张亢说,夏国的横山部、州、城、寨,距离宋朝边界近,经济、军事力量强,“夏兵器甲虽精,其战斗不及山界部族,而财粮尽出其地”。^⑦事实上,西夏其他地区的自然条件或许不如横山,但人的尚武精神则是一致的。

党项西夏历世统治者倡导尚武的民族精神,又在政治体制上实行全民皆兵制,《宋史·夏国传》云:

其民一家号一帐,男年登十五为丁,率二丁取正军一人。每负赡一人为一抄。负赡者,随军杂役也。四丁为两抄,余号空丁。愿隶正军者,得射他丁为负赡,无则许射正军之疲弱者为之。故壮者皆习战斗,而得正军为多。^⑧

在以力角胜的历史环境下,夏国统治者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和政策,有利于充分地发挥民族特长,提升国家的战斗力。因而能够有效地应付来自宋、辽、金等敌对政权的武装压力。连新崛起的蒙古国成吉思汗那样的劲旅,在围攻西夏都城时也一度不能得手,而被迫退兵。若不是西夏末期的几位国主在战略决策上“昧偏向之道,不知联金以拒蒙,而反联蒙以蹙金”,^⑨终至精锐耗尽,唇亡齿寒,造成金、夏两败而俱亡,则蒙古国要灭夏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二) 统帅才智勇英杰

党项西夏从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以来的国主,都是称雄一时的统帅人才,他们有勇有智,英谋善断,能够巧妙地利用周边政权的矛盾冲突。对于辽、宋、金等强大邻邦,尤其是对于它的东邻宋王朝,一贯采取强则入掠、弱则请和的办法,获得大量的金缗、茶叶、粮食等物资,不仅满足了统治阶层的需求,还多少减轻了国内民众的负担,进一步激励了兵民的战斗精神,是党项统治者机智多谋的一种表现。

党项西夏从李继迁以来的几代统治者,都有坚韧不拔、英勇善战的性格。还在夏州党项羌首领李继捧投宋那年,其族弟李继迁才20岁。当宋使要求他“赴阙”时,李继迁“乃诈言乳母死,出葬于郊,遂与其党数十人奔入地斤泽”,^⑩揭起了反宋的旗帜。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在宋朝知夏州尹宪等人的袭击下,李继迁被焚400余帐,连母亲、妻子都被俘虏,然而他仍

凛然不惧,机智应对,联络豪右,组织武装,终于东山再起,渐至强大。宋太宗至道二年(996),李继迁组织兵力,击败宋师“五路进讨”。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三月,李继迁又大集蕃部,攻陷灵州,遂以为都。宋朝“遣张崇贵、王涉议和,割河西(指今陕西的黄河西——引者)银、夏等五州与之”。^③这些都为西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李继迁死后,德明继立,他改变策略,东和宋辽,西攻诸蕃,从吐蕃、回鹘等西北民族政权下夺来了凉州、甘州等农牧业发达区。使党项政权的地盘“东拒黄河,西阻弱水,南跨青海,北控居延,绵亘数千里”,^④于是通西域,扼羌瞿,“制驭西蕃、灵夏之右臂”。^⑤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德明打败辽主亲率的50万大军。次年,辽国不得不册封德明为尚书令、大夏国王。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德明建怀远镇为兴州(今宁夏银川市),这就是后来的西夏都城。

继德明而立的李元昊,更是一个雄心勃勃、诡谲英断、敢于出手拼搏的杰出人物。史载他“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弱冠,独引兵袭破回鹘夜洛隔可汗王,夺甘州,遂立为皇太子”。他嗣立后首先为夏政权创立了官制。^⑥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元昊攻取瓜、沙、肃三州。在占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州等广大地区的情况下,乃以兴州为都城,阻河,依贺兰山为固,始大封官职,布防军队,自制蕃书,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自称皇帝,正式建立了夏国。这一切反映出—个少数民族领袖人物的雄才大略和胆识。

元昊以后的夏国主,也都有各自的政治长项。用《西夏纪》编撰者戴锡章的话来说:

谅祚继元昊而立,弱而能强。秉常受制于母后,失而旋复。乾顺享国最久,拓地亦广。仁孝文治有余,武功不足,然能诛任得敬于僭窃之后,乾断独伸,犹能转危为安,不失令主。^⑦

党项统治者善于挖掘邻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为我所用。正如宋名臣富弼所说,元昊“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致使“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⑧元昊等西夏统治者在借用宋朝资源上最得力的一手是挖掘吸引宋朝的人才。他们将宋朝大量落第士人和怀才不遇

者招揽过去,授以高爵,委以重任,使彼敌国之才臣,来为己用。

在内部行政管理上,党项历世统治者充分考虑和照顾到党项人喜欢山居野处,“各为生业”、“不相往来”^⑨的民族习惯,对各部族实行柔性管理政策,^⑩从而得到了所属部落的拥戴。宋太宗雍熙二年(985)二月,处在极度困难中的李继迁会集当地“豪右”,问他们:“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李氏,能从我兴复乎?”众曰:“诺。”^⑪正是由于党项拓跋氏对当地部落“世著恩德”,因而在李继迁遇到挫折的时候,各部族对他不离不弃,始终表示“拥戴”。

(三)军事地理环境优越

《辽史》作者云:“西夏弹丸之地,南败宋,东抗辽。虽西北士马雄劲,元昊,谅祚智勇过人,能使党项、阻卜掣肘大国,盖亦襟山带河,有以助其势耳。”^⑫这是强调西夏的地理环境助益了其军事活动。

西夏的周边环境相当复杂,在夏宋交兵最多的毛乌素沙漠以南,绵亘着千里横山,向西有天都山、马衔山,这一线不仅“多马宜稼,人物劲悍善战,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⑬稍北沙漠连绵,易守难攻。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五月,宋朝鄜延路经略使沈括等在向朝廷奏报陕西军情时,分析毛乌素沙漠以南、横山一带的地理环境说:

历观前世戎狄,与中国限隔者,利害全在沙漠。若彼率众度漠入寇则彼先困;我度漠往攻则我先困。然而西戎常能为边患者,以漠南有山界之粟可食,有山界之民可使,有山界之水草,险固可守。我师度漠而北,则须赢粮载水,野次穷漠,力疲粮窘,利于速战,不幸坚城未拔,大河未渡,食尽而退,必为所乘,此势之必然也。所以兴、灵之民常宴然高枕,而我沿边城寨未尝解严者,地利使然也。^⑭

事实确实如此。西夏侵宋,常以横山一带为基地,补充粮马。宋军来攻,可战则战之,战不利则逃入沙漠,使宋军挽运困难,追赶不及。等宋军退去,夏兵又出来继续入掠,宋人疲于应付,无可如何,这是夏国与宋长期对垒的地理优势之一。夏境西部、北部的沙漠戈壁,西南的祁连山,南部和东北部的黄河天塹等,在当时的军事技术和战力条件下都极有利于攻守,在西夏对付西州回鹘,吐蕃诸部和宋辽金政权的军事活动

(四) 经济基础雄厚,置兵不用禄食

在畜牧业方面,西夏几乎每一个州都有适宜发展畜牧业的牧场。河西的祁连、焉支、马鬃等山脉,冬温夏凉,善水草,宜畜牧。汉唐以来就有“凉州畜牧甲天

西夏“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这和宋朝的“日给廩食，月给库缗……馈输满道不绝”，^{⑤7}形成鲜明的对比。

综上,宋、辽、夏、金时期,西夏占地面积和人口数量虽少,但其经济基础和军事形势确有长人之处,尤其是从建国以前的李继迁到建国以后的元昊、谅祚等历世政治家,有勇有谋,胆略智慧过人。优化的资源整合和有利的内外环境,弥补了诸多不利因素,因而能够以小御大、以弱敌强。仔细考察西夏立国长久的史实,会给人以许多有益的启示。

③③《隋书》卷83《党项传》。

⑤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34, 宋仁宗庆历元年十一月。